

收稿日期:2023-04-25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特质的五维论析

孙可欣, 欧 健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破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独立自主探索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智慧的现代化新路。从比较研究的视域论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道路范式的突破创新,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理论支撑、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独立自主探索和拓展现代化路径的优秀范本,形塑了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发展模式,完成了外生被动向内生自觉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人民至上的价值诉求、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平包容的文明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优势的重要表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原创性的理念制度建构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道路谱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道路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3)04-00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22VRC015)。

作者简介:孙可欣(1997—),女,河南许昌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欧健(1971—),男,河南固始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4.04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体现了总书记对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大势的战略性研判、对中国道路独特价值的智慧洞察以及对中国模式原创性贡献的系统性审思。深入研究考察这一重大时代命题,论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维度,以比较研究的视角概括性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与原创性智慧,在新时代具有尤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蕴。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人民至上的价值诉求、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平包容的文明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优势的重要表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原创性的理念制度建构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进

程的道路谱系。

一、领导力量之维: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特质

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崇高理想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主心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完善、拓展过程中的鲜明特色和最大优势。“政党在所有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竞争中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决定的。”^{[2]136}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中肯定了政党在新兴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政党作为连接公众与政府的中介干涉变量、社会和政府依赖的重要组织的依附变量和国家中象征未来社会缩影的独立变量,“在新思想的形成以及新思想交流渠道的构建,在领导者与公众之间关于权力产生、动员和引导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企业家角色”^{[2]140}。中国共产党有西方政党理论界定的政党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但其产生背景、理论基础、使命性质、主体意识、目标追求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本质的区别。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全人类谋解放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陷入深重社会民族危机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传播影响下应运而生,自诞生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肩负起拯救中国于危局为中华民族求得独立复兴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解放全人类的双重使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服务于资产阶级特殊利益,往往成为资本利益的代言者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决定了其不会被资本逻辑腐蚀,自始至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视人民为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为人民谋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一以贯之地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使命意识,“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3]。

其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具有强大整合组织能力与全局布置能力、能够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优势的强大政党和权威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4]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各种资源分布相对分散,如果没有高效系统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合理调配能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对人力物力等资源统一安排、集中利用、形成合力,中国就无法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重大历史性变革、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腐败、分裂、动荡和易受外来影响,凡此皆属软弱政党的痼疾,而非强大政党体系的特征”^{[5]374},而“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5]377}。纵观全球,很多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国家都陷入了长期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和社会混乱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却以其系统、科学、高效的领导能力和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组织动员力、长远规划能力、统筹协调力和卓越战斗力汇聚起磅礴力量带领中国人民应对复杂国内外局势,克服多重历史考验,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历史方向持续前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相伴而生、相向而行。”^[6]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以大党独有优势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属性,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精神内核、政治气质和路径表达,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共识和彰显个性有机统一的创新实践。

二、社会理想之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以“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7]27}为使命目标的为民造福的现代化。“现代化”简明表达了不同地域与

传统的国家对建设一个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农业商品化、科技现代化、社会法治化、文化理性化的社会的相似愿望。现代化作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动态一般性进程,具有不预设任何道德立场和伦理规范的价值中性,各个国家可基于自身社会条件、历史传统、文化信仰赋予现代化道路不同的价值预设和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现代化终极目标的内蕴基准,指证出现代化路径多样化的风格特质。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国家整体富裕程度的提升并不必然与多数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裕程度相挂钩,以资本增值逻辑为首要和最终价值目标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收获了较高的GDP增长,但国内人民的收入却停滞不前,尤其在美国,少数金融寡头占有了社会90%以上的财富,资本家利用市场势力进行剥削性质的权力寻租,极大损害了社会公平,导致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不断尖锐,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充分印证了“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在于社会财富无法公平分配”,一些经济学家信奉的涓滴经济学也无法解决发达国家贫困阶级的生活困境及其同富裕阶级巨大财富落差的问题。究其本质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已经被国内的金融寡头牢牢操控了国家经济与政治,其现代化的道路目标指向仅仅是“富裕”而非“全体人民的富裕”,所以,巨量的财富也只是服务于少数人的一己私利,其来源于少数财富垄断者对国内外民众的压迫剥削。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共建共享,内蕴“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7]22}的正义理念与伟大使命。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独特的共享特质。“人民群众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8],中国式现代化以“奋斗幸福”和“勤劳致富”的理念激活了人民创新创业活力,强化了人民的劳动意识和主体自觉,同时完善和优化了贯彻社会公平正义的再次分配制度,逐步渐次满足了人民对更优质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优雅舒适的居住环境、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的合理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9]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等,无不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深切关注,对贯彻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身体力行,对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强调重视,对满足人民群众共同期盼的责任情怀和走共建共享式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决心魄力。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是全面协调的共同富裕,既包括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提升,也包括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有别于部分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只重视物质、陷入资本拜物教、只见物不见人的单向度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以“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7]23}作为现代化的内核追求,不仅要让人民“富口袋”,也要助力人民“富脑袋”: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筑牢理想信念、崇德向善、守牢纪律底线;注重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灵魂、启智润心,促进人们人文修养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升华;注重以红色革命文化锻造人民坚强的信仰意志,增强人们的精神主动和自觉,培育年轻一代独立包容的思想意识和磅礴奋进的精神力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表征,也契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不断趋向经济发达、社会公平、人民幸福的内在机理,是需要接续奋斗渐次、分阶段、逐步接近的一个长远目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卓越实践,将为世界各国提供中国式现代化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难题的独特智慧和优秀范例。

三、价值旨归之维:以人的现代化为本真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承载了亿万人民现代化期待,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本源动力,以人民至上

为价值旨归,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通往人类终极民主自由的全新道路。“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关于人的发展问题,不断为实现人的更好发展创造更加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条件。”^[10]英格尔斯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1]一个国家要达到现代化,不仅需要有与之相配的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还需要国民在人格、心理、行为上趋向现代性的转变。从经济、政治、教育、健康、精神等多维度赋权和投资于人,以人的发展激活自觉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根本动能,是一个国家走向长期、平衡、有活力、可持续进步的现代化模式的复归途径。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塑造的“人”,摆脱了对自然条件和人身关系的依附,但在劳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却不免陷入异化、外化、物化的困境,被自己的劳动对象所奴役,被自己创造的产品和价值束缚,难以成为满足自己身心需要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真正的人”。“匮乏的征服仍然局限于少数发达工业社会地区。这些地区的繁荣掩盖了在它们的边界内外存在着的‘地狱’,它们的繁荣还扩散着一种压抑性的生产力和‘虚假需要’。”^[12]在资产阶级制造“虚假需要”和“虚假满足”的部分西方现代化国家,民众甚至认为他们享受着一种舒服的、不用大脑的自由,实际上他们在所处的单向度的社会被严重地“物化”和“工具化”,丧失了自身具有的否定、批判和超越向度,成为不再拥有自由意志的“单向度的人”。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因素的重视和“以人民为中心”为现代化建设谋篇布局的选择,“从根本上破解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价值的宰制”^[13],建构了旨在创造“人”的真正的历史、孜孜以求人民生活的全部丰富性与超越性的现代化特质,深刻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宗旨价值、建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4]189}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构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始终保持对人的价值的考量,始终坚持着人在现代化实践中的主体地位。”^[13]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本质要求。广泛、健全、充分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是中国式现代化贯彻“人民至上”理念的特色实践,体现了对人民广泛权利与自由的制度保障与深切关怀、对民意的尊重接纳和对民情的体恤关照。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立体式、多层次、全链条、全覆盖的政治文明实践,不同于西方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为资本逻辑服务的选举民主,后者的民主沦为只供少数人享受政治特权的虚伪的、流于形式主义的民主,而“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和核心要义”^[15],中国式的民主政治致力为人民提供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真实有效服务、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把自己打造成徒有光鲜华丽表象的装饰品和摆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在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党情、民情做出的历史、理论、实践有机统一的批判超越和伟大创造,是真正把人民的利益和诉求放在心上,尊重人民作为国家主体的首创精神,为人民开拓更广阔的参政议政渠道,“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全方位、全领域、全天候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15]的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独具特色的民主。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的宗旨,推动了创造一个有助于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全方位和多层面实践的进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作为砥砺奋进的价值归宿的深刻映照,也是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追求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人民性立场的中国诠释。“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14]192},使人的丰富性、全部创造性和自我完整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持久深化拓展,“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16]928},在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不断实践中终将延伸抵达必然王国的彼岸,此时“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6]929}。由此可见,社会以其所能

提供的经济、技术、环境、教育、健康、精神文化等条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的丰富本质和创造潜能的实现则是社会通达自由王国的先决条件。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使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任务目标的实现面临前所未有的艰辛与复杂,目前,中国人口总数超过了现有发达地区人口的总和,中国提前过渡到了老龄社会。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元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条道路根本特质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概括性论断的同时,仍然将“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应实现的总体目标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坚定人民立场,坚持将人民利益放在至高地位,以推进造福人民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以贯之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17]中国在过去的现代化建设中将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以让人民得到实惠的目的导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秉持“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的价值信仰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取得重大成果,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7]11},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和使命意识增进人民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织就多层严密的保障网,为通往自由解放的人的理想状态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化路径条件。

四、人与自然关系之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守正创新的基础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内核的绿色、美丽、平衡、可持续的和解之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进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4]158}。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还提供了用于劳动加工的生产资料和作为艺术创作对象的精神食粮,人的类本质也只有在与自然界的交互作用,在人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实践创造中才得以确证,只有在探索自然本质的科学发现中才能被清晰认知,“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4]161}。自然力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跃升创造必要前提,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是一切科技创新的理论基础,人既可以能动地利用生命力、欲望、热情和天赋汇聚的主体力量改造对象化的自然界,也作为自然的、脆弱的、有限度的、受制约的、对象化的受动性存在物被自然牵引改变。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傍、相互构造的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是避免现代性危机、有效应对现代化和生态化之间的矛盾、持续推进拥有更加广阔发展空间的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前提。“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8]面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承受限度的根本性矛盾,不同的思维方式、哲学基础、文化理念、价值取向会对一个民族国家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发展目标、制度安排等层面起潜移默化的思想引领作用,最终形塑和熔铸了各国现代化道路差异化的生态意涵,生成各国在处理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人民利益与生态利益的辩证关系时不同的领悟与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文明之维的独特性、革新性、协同性、超越性,在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模式比较分析中更加明晰显著。

其一,道路发展模式的差异。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在原始积累阶段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后期,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产业链优势地位将资源消耗高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以“生态殖民”的手段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中曾因追求速度采用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

式,在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中国很快认识到这种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逐步以生态文明价值理念重塑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模式,重新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内涵和价值向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建设布局实现了从“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的转变,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将“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和“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并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秉持“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命运共同体情怀,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全局眼光对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谋划和战略布局,促进中国向以技术创新为引擎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转变。从道路发展周期来比较,中国在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较之西方更早具有生态保护意识、更快实现绿色道路转向。此外,中国摒弃了西方在发展中非此即彼和零和博弈的道路范式,不仅不会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转嫁他国,还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1]365},向世界做出“双碳”目标的庄严承诺,主动承担与我国国情相匹配、发展阶段相符合、治理能力相适合的国际环境治理义务,并力所能及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帮助。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丽未来不断趋近的富于中国智慧、中国关怀、中国担当的生态惠益之路,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以征服和掠夺为发展底色的反生态性的现代化范式。

其二,道路内蕴理念的差异。在遭遇一系列现代性危机后,在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后果反思基础上,西方学者愈加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自1949年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对土地的生态功能进行细致描绘和阐释,指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9]以来,西方生态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深绿”和“浅绿”两种思潮。“深绿”思潮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作系统性反思,将“生态中心主义”作为伦理主张和价值向度,反对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希望通过生态价值观变革、生态自治主义和贬抑人类权利的方式解决生态危机。“浅绿”思潮则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根基,强调其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专制主义”,主张以现代主义的工具理性调和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科技创新、严格制度、统筹政策、产业合理布局等方法手段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持续性,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绿色转型。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共有的缺陷是无法辩证统一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合理平衡“生态利益”与“人类发展权利”,在探讨生态危机的缘由和寻求破解方案时只停留在抽象价值观维度而未从历史和实践的维度考量问题根源,最终给出的解决途径缺乏现实可行性、未能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致力于全球的环境友好与生态和谐。西方生态理论始终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上,是一种捍卫西方资产阶级统治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框架内寻求维系资本存续条件的“护卫型理论”。无论是“深绿”思潮还是“浅绿”思潮,都不承认生态财富与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之间的辩证统一和价值转化关系,否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正当经济权益和生态权益,其本质上体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特殊利益,因而不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之维关注的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诉求,这一点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特质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世界生态价值共性的深刻体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念指引和价值意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论来源上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批判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智慧,在吸收西方生态理论积极成果的同时超越了其内在对立、割裂、争议、徘徊的理论弊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秉持的生态理论,一方面区别于片面追求生态利益,否定人类利用改造自然、追求正当合理发展权利的“深绿”思潮,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特质和实践导向,以绿水青山奠定金山银山之基,把生态财富转化为由人民

共享的社会财富,以绿色低碳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有别于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为核心,坚持现代主义工具理性思维,捍卫不平等资本主义国际生态话语体系,不顾惜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权益,为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市场利益服务的“浅绿”思潮,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将良好生态作为普惠的民生福祉和重要的公共产品,创造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逻辑代替了资本逻辑,以人与自然平等互利的生命共同体超越了资本的全球利益,以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真诚决心超越了唯我独尊本国利益至上的极端自私价值取向,鲜明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人与自然关系处理和生态危机应对上的文化特质、价值特性、思维禀赋和哲学智慧。

五、文明理念之维:包容共赢的交往范式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以“和合共生”“和而不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文明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路径。“文明的起因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种关系。”^[20]任何文明都是多种元素、关系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塑造一种文明内核精神、形态风貌、生命特质的决定性力量,人的本质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501},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思考和处理方式往往能够透视出一种文明与众不同的根性、伴随个人或集体、趋同或求异、冲突或和睦、内敛或扩张等价值理念的界定和分野,文明分道扬镳踏上相异发展道路、拥抱彰显个性风格的现代化命运。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被殖民扩张、暴力掠夺、剥削奴役、屠杀灭绝笼罩上浓重血色的霸权之路,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革命的发生为其侵略扩张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那么西方近代自由主义阵营内含的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则给予了掠夺剥削行径信念价值上的依循支持。无论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立法有用性的推崇,还是以“勤俭”和“自助”为口号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个人主义和不平等主义的认可,都实际上为默许和合理化西方白人资产阶级的优越地位、社会下层阶级的悲惨处境和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苦难状况找到了一套合乎逻辑的文明伦理,而此后广泛盛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将这一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仅在1871到1900年间,西方国家就攫取了超过1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21]503}。除此之外,殖民者给原住民带去的还有灭绝式的大屠杀,“40多年来,这些西班牙人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对当地居民滥施暴行,肆意屠杀,其残暴程度令人触目惊心”^{[22]18},“由于西班牙人杀人如麻,致使原来生活在西班牙岛上的300多万土人,现在只剩下200人”^{[22]18}。西方列强毫无廉耻的侵略蹂躏、罪恶的殖民战争、疯狂的财富攫取和残忍的种族屠杀,恰如达尔文主义信徒所言,是“滴着鲜血的牙齿和利爪”^{[23]327}的生存竞争。达尔文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对适者生存和生存竞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21]484},尤其是“在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19世纪后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21]484}。同时,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基督教文明排斥异己、缺乏包容的价值特质,也促使“欧洲人在开始其海外扩张时采用了一项便利的原则,即他们有权不顾相关的土著民族而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21]415}。西方社会内蕴的文明优越、文明霸权和文明冲突的理念为近代、现代世界带来了数量繁多的战争,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战争代价”项目数据显示,“后9·11时代”美国发动战争造成的军民死亡总数高达92.9万人,至少3800万民众流离失所,而且这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实际数量可能介于4900万至6000万之间^[24]。被侵略的文明遭受的伤害在西方文明观念中被视为一种优胜劣汰或者必然性的历史进程,因为其信奉的价值更多倾向于对立而非交融、

纷争而非和平、一元支配而非多元平等,“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25]45}。亨廷顿指出:“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愿望并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他们便会成为‘错误意识’的牺牲品。”^{[25]285}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用其惯用的西方思维将中国视为和平的霸权国家,强调“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25]213},充分映照出一些西方国家对“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零和博弈”等逻辑的笃信与价值认同。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兼容普遍性情怀与特殊性使命的独创性。

中华文明尊重人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多彩性,“和而不同”是其一向秉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态度。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采取“以同裨同”的国家治理方式,只看重社会的一致性与趋同性,是让单一性质的事物相互叠加,扼杀了事物成长发展的活力,最终会威胁国家的存亡。春秋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区分了“和”与“同”两个概念。那时的中国人已经领悟到,事物之间矛盾对立的存在状态是宇宙万物客观规律的现实表征,唯有在正视、理解和接纳这种多样性和不一致性的前提下追求对立中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万事万物的浑融、平衡、滋养与发展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1]424}其中表达的核心思想“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富智慧的哲学思辨和文明魂魄的集中体现。《论语》中的“以和为贵”,《礼运》里的“讲信修睦”“天下为公”,《中庸》表述的“中和”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经》言述的“乾道变化,各正其道”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管子》所载的“和乃生,不和不生”以及“养之以德则民和。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这些无一不在真切阐释和生动呈现中华文明对一个和谐包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文明之间共同、共生、共荣的世界的政治伦理追求,无一不浸润与沉淀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价值导向、交往方式和道路选择。

其一,中华文明的独特理念形塑了广泛凝聚共识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共识不等于“普世价值”,而是从全人类真正的、本质的、共同的利益与关切中抽象概括出的价值和原则表述。不同国家对共识的理解、接受与遵循是建构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也是引领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美好前景的思想之基。中国共产党以开阔的胸襟和深厚的人类情怀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475},强调以承载各国人民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世界发展方向、启示国际关系进步路向。

其二,中华文明的价值特质培育了真诚尊重差异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中国向来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理念,充分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化特质,从不对文明进行优劣、高下划分,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63}的尊重平等姿态与文化、种族、肤色、宗教、社会制度都完全不同的国家开放交流、对话合作、建立真诚友好互信的关系。中国从不认为这世界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制度、道路能够归纳和概述不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和历史文化传统造就的个性特征的全部的丰富性,因而完全尊重不同国家选择符合其国情实际的独特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

其三,中华文明崇尚和睦、重义轻利、追求公平正义的道德理想深化了坚守和平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和平发展写入宪法的国家,中国对和平发展的坚守和对公平正义的国际治理体系秩序的追求一以贯之、始终不渝。中国对走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26]265},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26]265},更是中国愿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的文明责任意识的生动展现。“自1990年以来,中国已向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目前有2200余人在联合国8个任务区执行任务,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名列第一。已组建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和

300人规模常备维和警队,成为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中数量最多、分队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中国加入20多个国际军控条约及机制,全面履行各项条约义务,坚定维护多边军控条约权威性和有效性。”^[27]中国在朝鲜半岛、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缅甸、中东等地区积极发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建设性作用,有别于制造民族国家间冲突、战争、对立、仇恨来坐收渔翁之利、发战争财的西方国家,中国自始至终将自己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紧密相连,以国际眼光和世界视野关怀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状况与发展利益,真正做到了胸怀全人类,心系大多数,情牵世界文明未来。

其四,中华文明互利合作、共生共荣的现实追求绘制了中国式现代化别具一格的生命图景。2022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10.5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7.7%(折合209.7亿美元,增长3.3%),占同期总额的17.9%^[28]。中国坚持互利共赢、普惠发展的价值理念,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设立合作援助基金,不断开拓与世界各国合作新领域、培育新兴增长点,实现发展自身与惠及全球各国人民的有机统一,以充满中国风格、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务实合作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帮助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指导下努力做大合作蛋糕,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1]425}。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的共生共荣理念,不仅成为沉积中国道路文明特质和独特贡献的价值根基和精神引领,为世界创设了文明和谐共存的历史远景,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价值依循。

六、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的中国特色。”^{[7]22}现代化作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思想意识的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变革进程,其界定的构成要素、发展阶段、内在规律、战略目标在不同国家间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其蕴涵的具体特征、战略安排、发展次序、实践样态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多样化和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复刻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道路,而是融中国的特殊经济社会条件、实践经验、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智力支撑,而且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9],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共性与个性协调统一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气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0]人类文明的多彩植根于不同国家道路范式的多样性呈现,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规律和一般性样态源自无数国家民族具体道路实践的共同建构,失去了个性特色的世界文明形态必然黯淡无光,从根本上说,政治制度、经济范式、文化特质等乃是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深厚内生价值,如果它们轻易被否定,这个国家和民族将走向精神虚无、价值空虚、人心涣散,最终其主体意识和存在合理性也会消亡。现存的独立民族国家无一不是在对发展道路的斗争和对自身特殊性的捍卫中自证了主体价值,才不致于被居心叵测的霸权主义者和优越论鼓吹分子动摇信仰和政权。中国从未否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而是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有益成果,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在自身探索过程中深刻领会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昭示的现代化建设规律,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特点的、闪耀独特智慧的中国式现代化

新道路,展现出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中国式”创新特质。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6][156]}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实践探索中总结彰显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规律,注重在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保持本土特色并发扬优势,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制定切合国情的政策、方针、战略、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违背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充分契合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根基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脉动节律,呈现出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特征,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中国式现代化培塑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发展模式,为世界上那些希望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智慧,彰显中国力量的方案借鉴,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丰富了世界现代化探索的道路谱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23.
- [4]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与实践探索(专论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55.
- [5]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 [6] 刘小钧.强大政党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6):11-18.
-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8] 向汉庆,唐斌.共同富裕的政治伦理内核[J].云梦学刊,2022(2):102-110.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
- [10] 鲁广锦.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权证成逻辑[J].人权,2022(6):9-29.
- [11] 英格尔斯特.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8.
- [1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91.
- [13] 王虎学,凌伟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向度[J].学术研究,2022(11):13-20.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董树彬.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6):58-65.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
- [18] 赵建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J].中州学刊,2023(1):12-17.
- [19]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3.
- [20] 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3.
- [2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2] 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8.
- [23] 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327.
- [24] 新华社.“世界最大乱源”:美国对外战争极简史[EB/OL].(2021-06-28)[2023-03-12].<https://news.cctv.com/2022/06/28/ARTIOLJaOwJzlQ9heI4RIswU220628.shtml>.
- [2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2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7] 杨洁篪.五十年深化同联合国合作 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求是,2021(1):32-41.
- [28] “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2022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EB/OL].(2023-02-13)[2023-03-12].<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tydy/tjsj/202302/20230203384457.shtml>.

- [29] 王立胜.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中不断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2):10-17.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12.

A Fiv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ve Qualitie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UN Ke-xin, OU Jian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new path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wisdom, independently explo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in the paradigm of the path and provid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created an excellent model for exploring and expanding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independently, shaped a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comm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and complete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exogenous passivity to endogenous self-consciousness.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ocial ide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value of people first,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a peaceful and inclusive civilization are important expressions of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hich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path spectrum of the world modernization with its system of original concepts.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novation of path

〔责任编辑:王建霞〕